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办

當代港澳研究

Studies on
Hong Kong and Macao

第 11 輯

陈广汉 黎熙元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陈广汉 黎熙元 主编

當代港澳研究

Studies on
Hong Kong and Macao

第 11 辑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港澳研究·第11辑/陈广汉, 黎熙元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306 - 04305 - 4

I. ①当… II. ①陈… ②黎…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香港—文集 ②区域经
济发展—澳门—文集 IV. ①F127. 658 - 53 ②F127. 65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0620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李海东

责任编辑: 李海东

书名题词: 廖蕴玉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李海东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东莞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9 印张 2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广汉 封小云

郭正林 饶美蛟

王 珺 许学强

杨允中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陈广汉 陈丽君

黎熙元 刘祖云

毛艳华 袁持平

周运源

主 编：陈广汉 黎熙元

编 辑 部：张光南 郑婉卿

编辑部地址：广州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当代港澳研究》编辑部，510275

电 话：(020) 84113236

传 真：(020) 84036749

电 子 邮 件：jshkmac@mail.sysu.edu.cn

网 址：<http://hkmac.sysu.edu.cn>

目 录

专题：香港自由行研究

编者按语	黎熙元	1
香港社会 2012：跨境与边界控制	黎熙元	2
自由行对香港各个行业薪资的影响	王 煜	11
中国内地游客对香港的经济影响分析 ——基于游客人数与物价变动的关系研究	岑伟波	21

港澳专题

香港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四大支柱产业	陈雄超	35
构建中国四法域统一的国际海上货运代理制度	李 可	46
香港特区政治体制模式的特征分析	许 昌	57
事件研究法对香港股市效率的分析	杨 柱	65
澳门产业结构优化动力机制的构建分析	谢四德	76
澳门华商何贤研究述评	胡 芸 夏 泉	96
澳门现金分享计划及其制度化方向	鄧益奋	104

中国经济论坛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VAR 模型分析	王亚丹	111
---------------------------------	-----	-----

Contents		127
征稿启事		131
投稿方式说明		132
稿件体例		133

专题：香港自由行研究

编者按语

黎熙元

近两年来，香港大众舆论关于“香港个人游计划”的讨论非常热烈，正反两方面的理由看起来都很充分。正方认为它带来大量外来消费，直接推动了香港服务业的扩张，提高了就业率，对香港经济增长具有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反方认为它带来的收益主要使大资产者受惠，中下层市民分享不多，游客却挤占了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大量输入性需求推高了香港本地物价。双方争论的焦点显然不仅仅是把“香港个人游计划”视为一个经济论题，而是把它视为一个政治论题来讨论，关键点是香港与内地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本专题有两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回应这些舆论最重要的争论点：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收入分配和“拥挤”效应。通过数据分析，细心的读者能够找到“香港个人游计划”的具体作用点和作用效果。另有一篇文章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关于“香港个人游计划”的争论其实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意图，反映出即使在最讲究自由资本主义的香港，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是公众唯一的关注点。

香港社会 2012：跨境与边界控制

黎熙元

摘要：本文回顾了 2012 年香港发生的三次针对内地人跨境活动的社会运动及其后推出的政策措施，指出香港对其与内地之间的边界控制自 2003 年之后越来越严紧，与内地对香港越来越开放的趋势相反。这种变化反映出香港社会对本土利益及其与内地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反思的过程。

关键词：跨境流动；边界控制；香港与内地关系

自 2003 年“香港个人游计划”（以下简称“个人游”）实施以来，前往香港的内地游客总量连年上升，香港旅游发展局预计 2013 年内地访港游客将超过 5000 万人次。内地游客的访港活动也早已超出了观光、团聚、会议等传统范围，扩展到医疗、生子、上学、走“水货”等新领域。2012 年是香港市民对内地游客活动表达不满最多的一年，年内发生的比较大型的社会运动包括香港与内地网民骂战、抵制内地孕妇来港生育、“光复上水”行动，以及较小型的抗议活动如限制内地人在香港置业、限制内地人抢购奶粉、搁置“自驾游”、取消“一签多行”等。“个人游”在香港大众舆论中几乎成为一“虎”——谈“虎”色变。然而，“个人游”推出时，全港上下曾一致认为这是中央政府的一项“福政”，对香港振兴经济、增加就业具有直接、快速、正面的作用。港人对“个人游”态度的转变，不仅反映了香港社会近 10 年的结构变化，也揭示出香港经济和社会、物质和观念、制度规制和全球化之间的内在矛盾。

一、边界与跨境流动

边界具有多种存在形式，它可以是物理的、有形的，用以划分空间和管辖范围，也可以是观念的、无形的，用以区分不同制度、不同利益和不同社群与文化。边界的功能在于控制流动性，是控制外界和自我保护的产物。市场依靠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流动而生长和繁荣，市场的发展会跨越、冲击乃至拆除边界。但是，就一个管辖权确定的地区而言，其空间和资源等可控利益是有限的，同时传承性的观念和身份认同也是有限的，利益控制和认同必须构建、维护和巩固边界。这样，市场发展、社会整合和行政管理三者对边界的设置必定不断产生矛盾冲突。由于一个地区内各社会阶层和群体在市场利益分配中不均等，对边界开放的速度、程度的看法就有所不同，因此，边界的确定是界内和界外社群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冲突、协商的结果。

国界是最重要和最显然的边界，贸易壁垒、移民法例一直是论辩最多的话题。资

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牵动了各国国内外各大小区域生产分工和消费格局的变动，同时也推动了相近行政区的区域化整合，于是边界和跨境的学术讨论近 20 年来成为非常重要的论题。跨境流动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发生频率比跨国流动更高，而且在中观或微观的层面更细致而准确地反映出流动的特征和边界的特质。近期研究认为，跨国流动与跨境流动特征的相似性在于：流动是往返双向或多向的、边境两边的社会通过移民保持持续的联络和互相影响，这种流动受到边境规制的限制和移居地社会特征的影响。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并实行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在全球自由经济体排名中常名列前茅，被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典范”。无论是香港还是国际的政界、学界都一致把香港塑造为全球化的、自由的、没有边界的区域。虽然 1997 年以前香港与内地之间一直存在严格控制的边界，但这个边界主要是内地出于自我保护而设立的，具有主权的性质。基于保证香港顺利回归、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边界功能就变成维护两地不同制度，具有政治或政策的性质。主权统一必然推动区域互相开放，也必然推动制度体制的互相整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区域之间消除壁垒从而扩展市场，使比较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都会从中获益；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持续的互动能够减少彼此之间的差异而使区域文化趋同。因此从逻辑上看，香港与内地边界的放松或开放是必然趋势。在地方层面，临近香港的深圳乃至广东等各级行政区正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衔接和社会沟通互动；在国家层面，通过协调不同制度和社会经济互动以减少差异，从根本上有利于贯彻中国的单一制国家体制，因此中央政府也大力支持地方合作与整合。同时，香港政府也回应本地资本和市场的要求，致力于改善制度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与内地的协调问题。香港与内地先后签订了 CEPA 及多个补充协议（“个人游”就是 CEPA 附件的内容之一）；香港与内地各省市之间还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如被称为“一签多行”的深港旅游签证协议。这样，在经济市场的推动下，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边界控制在 2003 年之后逐渐变得宽松。

2003—2008 年内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香港与内地之间跨境制度宽松、过关程序便利化和交通设施对接，吸引了大量香港居民返回内地投资、创业和居住，其中 2005 年人数最多——40 万人长期在内地居住，26 万人在内地工作。2008 年金融风暴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高于港元对美元汇率，在内地生活消费变得不经济，港人在内地工作和生活的人数逐年下降，2010 年下降至 17.5 万人。^① 即使如此，这些两地生活的港人跨境频率仍然很高，平均每周往返一次。

反过来，内地到香港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自“个人游”实施后的 2004—2012 年 8 年间，访港旅客人次增长 2 倍多。随着内地访港人数增长，其他类型的跨境活动也不断增长。例如，内地家庭的港生婴儿数量增长 8 倍多；跨境学童是稍后出现的现象，3 年间也成倍增长（表 1）。

^①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第 57 号专题报告书》，2011 年 10 月。

表 1 内地居民的跨境人数变化

年 份	内地访港人数/百万人次	内地父母的港生婴儿数/人	跨境学童人数/人
2004	2180	4102	
2006	2500	16044	
2008	2950	25269	6768
2010	3603	41000	9899
2012	4860	35736 (2011 年)	12865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出入境处。

来自内地的巨大客流量及其消费需求，似乎大大超过了香港业已形成的服务供给体系的承受力，这个体系原本只是为满足本土 700 多万居民和每年约 500 万游客（2003 年以前的年度平均游客数量）的需求。内地游客及其多种多样的跨境活动在香港不同服务领域和城市空间引起了程度不同的拥挤、短缺甚至混乱，至 2012 年终于爆发多宗香港与内地居民对立的事件。香港居民的情绪也极大影响了 2012 年上台的新行政长官及其班子的政策方向，政府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加强管制，甚至关闭原来趋于开放的边界。

二、边境管制的演进

香港与内地之间跨境活动与边境管制关系的演进在 2012 年集中体现在三个事件上：内地家庭跨境生育，粤港“自驾游”计划，打击“水货客”与限制奶粉出境。

（一）内地家庭跨境生育

1980 年以后我国内地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措施，在各地的实施细则都有所不同。因此，一直以来有意多生孩子的家庭都努力寻找可行的方式和地方生孩子，富裕的家庭选择到美国、加拿大、巴西等根据本地出生证明来登记为本地居民的国家生孩子，不太富裕的家庭则选择到国内不发达的乡村去生孩子。由于超生的孩子已登记为外国人或外地人，家庭所在地的计生部门通常就不会主动追究。“个人游”实施以后，有意多生孩子的内地家庭很快认识到去香港生孩子是一条方便、节省、可靠的途径，于是内地家庭赴港生子的个案在 2004—2010 年间迅速上升，至 2010 年内地家庭的香港新生儿数量达到 41000 个，与香港本地居民的新生婴儿数量相若。^① 随着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人数越来越多，原来只承担 700 多万人口服务量的香港医院妇产科出现床

^① 详细分析参见黎熙元：《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家庭策略特征及其影响》，陈广汉、黎熙元主编：《当代港澳研究》第 6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位、医生和护士短缺，造成公立、私立医院之间互相竞争招收医生、护士。为了应对这项意料之外的大生意、重整医疗秩序，香港医院管理局于 2007 年公布两项措施：一是预约，非本地孕妇必须在公立、私立医院预约服务，凭预约文件过关；预约配额由医院和医院管理局协商。二是收费标准，公立医院对预约个案收费 3.9 万港元，对非预约个案收费 4.8 万港元。这两项措施的出台刺激了私立医院之间的竞争，不少私立医院立即投资扩张规模，力求增加配额。由于对内地家庭接生的收费通常高于对本地家庭的收费，私立医院实际上更热衷于接收内地孕妇。于是香港本地家庭不得不面对这种困境：医院的资源和服务持续短缺，私立医院服务价格上涨。香港人还关注到，这些港生婴儿作为香港永久居民，有权分享香港人公共福利，等于损害港人利益。这种状况引起香港本地居民的不满，积累到 2011—2012 年还变为公众愤怒，由妇女团体组织的各种请愿示威行动和香港大众媒体吁请政府采取措施制止内地孕妇赴港。迫于舆论压力，香港医院管理局于 2012 年 5 月颁布规定终止全港医疗机构的内地孕妇预约服务，对非预约的接生个案收费提高到 9 万港元。

（二）粤港“自驾游”计划

粤港“自驾游”计划是 2010 年广东和香港两地政府签订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中的一项合作计划。其原意是粤港之间多个新增过境口岸投入服务，两地政府认为有空间可以考虑放宽私家车过境的限制，让一些未符合现有“两地双牌照”申请资格的私家车车主，能够申请一次性特别配额，使两地私家车车主可以多一个过境选择，以进一步促进粤港之间的经济、社会及文化交流。计划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过境私家车一次性配额试验计划”，内容是 2012 年 3 月 30 日开始，无论身份背景，每天 50 个名额，拥有 5 座以下右行车、港澳通行证、两地驾照的港人原则上都可申请北上广东，最多逗留 7 日。在 2011 年 8 月举行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 14 次会议上，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公布这个试验计划于 2012 年 3 月推出。计划的第二阶段是按照对等开放原则，广东私家车可以申请进入香港，但双方尚未商定实施时间表。当香港特区政府在 2012 年 2 月公布计划实施时，正值年初由于内地孕妇和“地铁进食”、“D&G 禁拍”等事件而引发香港与内地网民对立骂战余波未了，计划立即引来大众舆论反对，指内地车辆进入香港会带来众多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和法律纠纷。2012 年 2 月 15 日，一个称为“土地与正义联盟”的非政府组织向香港立法会提交了意见书，其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因为两地文化和现行法规的差异，现阶段开放‘自驾游’，危害远远大于益处。”2 月 19 日下午，22 个团体、1500 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前往香港的新政府总部请愿。^①其后有立法会议员在香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动议全面搁置该计划，议案未获通过；但委员会通过无约束力议案，促请政府在社会有共识后始推行让内地司机南下香港的第二阶段“自

① 《内地车，载不动香港许多愁——忧思空气与交通，争议粤港自驾游》，《南方周末》2012 年 2 月 23 日 A18 版。

自驾游”。在此次会议上，多名议员担心第一阶段计划生效后，特区政府便要开始执行第二阶段计划，即容许内地司机南下香港自驾游。时任香港特区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则解释，2012年推出的第一阶段计划属非常小规模之试验，强调政府并不急于实施第二阶段计划，必定会做好把关工作，好好处理大家关注的问题。由于特区政府并未宣布收回第一阶段计划方案，因此它应该仍在试验实施当中；第二阶段计划则没有下文。迄今这个计划所涉及的跨境管制只是内地向香港单方面开放。

与粤港“自驾游”计划命运相似的是深圳居民一年内一次签证多次往返香港的特别“个人游”，俗称“一签多行”。这是2008年深港合作会议上双方签订的一项深化两地开放的协议，也计划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于2008年4月起实施，内容是深圳本地户籍居民（大约400万人）可申请一年一次签证多次往返香港；第二阶段于2012年9月起实施，把“一签多行”的可申请范围扩大到常住深圳的非深圳户籍居民。由于香港媒体和各相关团体与部门（包括入境处和旅游发展局）都呼吁现香港特区政府审慎考虑新措施，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于2012年8月31日公开表示，他已与中央商讨未来短期内不会按新措施发出签注，因为香港社会普遍担忧内地旅客涌入香港会导致香港基础设施超负荷承压。

（三）打击“水货客”与限制奶粉出境

“水货客”一词源自2012年9月15—18日的“光复上水”事件：部分香港居民响应网上发起的一个集体行动，在上水地铁站抗议内地游客在上水地铁站附近商场大量购买商品并占道分货的行动，行动称这些来自内地的带货游客为“水货客”。参与者认为上水区被内地“水货客”占用太多，严重妨碍本地居民生活。这些居民的行动很快获得了其他市民和组织的支持，媒体舆论再次迫使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干预措施。最初有港铁公司宣布旅客自带进站的行李不得超过规定体积，但收效甚微。继而特区政府警务处和出入境处介入，搜查上水区商场和过境区域，扣查涉嫌带货的人士。同时特区政府也请求深圳边境部门配合打击。

打击“水货客”事件背后的法理逻辑相当曲折。在香港方面，既然是自由港，只要不涉及违禁物品，货物出入境不应受到限制；在内地方面，海关规定如果居民携带的只是少量商品（海关并未明确指出数量多少的界定），则通常不被视为销售用途，一般也不会扣查。因此，平时两地居民跨境时随身携带的货物，两地海关一般会视之为自用或零散边境贸易而不会予以干预。因此对付“水货客”不能以反“走私”的名目来执法。香港警务部门在行动时使用的执法理据是：“水货客”持“个人游”签证入境，但在香港从事非旅游活动，违反逗留规定。相应的惩罚是没收货物、递解出境。深圳海关也同时采取了类似做法。事情延续到2013年春节前，媒体报道，由于内地“水货客”抢购，香港出现婴儿奶粉短缺；有些网民甚至把求购奶粉的邮件发去美国白宫。这次舆论压力的结果是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自2013年3月起过境旅客只能携带不超过两罐奶粉出境，违例者处以罚款及扣押惩罚。

从上述三个重要事件可以看到香港和内地之间边界控制演进的特点：

其一，2012 年控制措施特别多而且推行急促。自 1997 年以来，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 CEPA 签订之后的数年间，香港和深圳市乃至广东省位于边界两边的地区政府都致力于放松边界控制、扩展通关合作领域。为加强政府之间的协调，还建立了粤港联席会议和深港联席会议制度，在年度会议中制定来年的工作重点，使执行部门能够有清晰的实施时间表。2007 年国务院批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之后，粤港两地进一步签订《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在这种推进区域融合的气氛下，产生了更多的开放边界的措施，如上面提及的 2008 年分阶段实施的深圳居民“一签多行”、2012 年分阶段实施的“粤港私家车自驾游”等。但到 2012 年，原定在当年实施的、涉及香港对内地居民开放的计划几乎全部暂停。不仅如此，原来已经开放的领域，也会通过香港特区政府的法令实施无时间限制的单方面关闭。

其二，边界控制的意图通常是保护内部市场或者阻挡难民潮，而 2012 年的边界控制意图在于回应社会舆论。内地孕妇医疗服务预约急增促使不少私立医院从 2009 年起投资扩张规模，而内地孕妇付费较高对私立医院发展更有利。停止预约的控制措施基本截住了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但同时也使私立医院已经作出的投资不能获得预期回报。因此该项措施只具有回应香港当时社会舆论的效果。再看“水货客”事件，依据“违反逗留条件”不可能严格区分“水货客”和旅游者，执法方实际上是在上水、罗湖等所谓内地“水货客”比较聚集的地方检查那些携带货品特别多的人，结果是“水货客”转去别的地方购买货品，或者到人流较少的地方分货。因此，所谓打击“水货客”的行动所产生的作用主要是驱散在上水的内地“水货客”，而不能阻止在香港其他地方活动的内地“水货客”或者香港本地的“水货客”，因而只具有回应上水居民要求的效果。从打击“水货客”到限制奶粉出境，边界控制的意图更加扑朔迷离。部分香港家庭坚称“买不到奶粉”，但奶粉供应商、零售商均认为不存在“奶粉荒”。^① 限带奶粉令实施后业界忧虑发展前景，当初把“奶粉荒”归咎于内地“水货客”，但保安局发现限带令实施后因违反法例而扣查的“水货客”七成是香港居民。^② 显然，奶粉出境管制的主要效果也只是回应了部分香港家庭的议论。

三、香港居民的边界意识

从 2012 年香港的边界控制变化可以观察到，香港民意的影响非常明显，即使所谓民意是被大众媒体放大而实际上可能只是少部分居民的意见。民意能够显著影响政府的管治自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而其中特别值得探讨的社会学论题是香港居民的边界意识。

① 《称港无奶粉荒 业界倡奶粉离境税》，《明报》2013 年 3 月 14 日 A12 版。

② 《李少光：水客多港人，冀“限带令”属临时》，《文汇报》2013 年 3 月 8 日 A04 版。

在加强边界控制之后，赴港生子的内地孕妇暂时被阻止了。它在香港社会引起的后续讨论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再度解释《香港基本法》当中关于香港永久居民的定义，甚至在 2012 年当选的行政长官及其领导团队也承诺推动之。1999 年因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导致特区政府修改入境条例：无论父母是否为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出生的婴儿可以获得居港权。重新查阅 1999 年香港大众媒体关于“庄丰源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舆论，其关注点是香港应不应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不同居民身份父母的港生孩子有没有平等权利的问题，即“法治”和“平权”，人们并不关注“庄丰源”案之后会有多少内地人因此而获得居港权。13 年之后，舆论倾向完全反过来，关注点是怎样才能通过释法阻止内地家庭的港生孩子获得居港权，这时港人的忧虑是内地家庭及其港生孩子都是外来人，不应该分享香港市民的公共福利。换句话说，边界控制的实质是身份限制，限制身份的意图在于限制群体福利不会被外来人分享。反对“自驾游”反映出来的民意性质与此类似但范畴不同，反对者的理由是保护香港的空气、环境清洁和交通秩序，其含义是社群的空间不许他人占用。

如果说抵制内地孕妇和“自驾游”所涉及的公共福利和公共空间尚可勉强概述为香港人的共同利益，那么打击“水货客”和限制奶粉出境就涉及多种不同的小群体利益。“光复上水”所指向的是集中在上水火车站及附近商场范围活动的“水货客”，受“水货客”影响就是在这一带生活、活动的居民；上水站附近的商业区和大商场当中有许多商铺，打击“水货客”无疑会影响到这些商铺的收益。同样，奶粉短缺只出现在某一两种牌子的婴儿配方奶粉，受影响的是使用这些奶粉牌子的很小一部分香港家庭；限制奶粉出境则会影响到奶粉经销商户以及“走水货”的香港居民。也就是说，打击“水货客”和限制奶粉出境，在保护了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只不过很可能利益受损者的数量比得益者少，在立场偏向明显的大众舆论当中被忽略了。在“限奶令”实施月余之后，业界代表开始在立法会动议在“限奶令”中附加“日落条款”，即指定某个时间法令自动失效。

由此可见，在仔细区分之下，2012 年导致边界控制的几项重要事件所涉及的所谓“香港人利益”其实并不存在一致性，而是涉及不同港人小群体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是一种本质化的论述，在这个论述面前所有其他利益都微不足道。在文化研究理论当中，本质化和内聚是群体遭遇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一般反应。港人利益这种论述的构建反映出香港居民比较普遍地接受这种假想——内地与香港存在互相竞争的权力关系，因此需要构建“港人统一体”来对抗内地。在这种认知框架下边界控制才会成为香港居民保护自己的壁垒，边界控制不论基于哪一种理由、采取哪一种方式，必先以阻挡内地人流为首要目标。

香港经济学者李钜威曾经指出，香港存在“经济至上”的社会意识，即赚钱的

动机高于其他动机，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会忽视其他性质的利益和目标。^①“个人游”由于大量内地游客的输入性消费直接推动了香港服务业扩张。从 2003 年之后的年度经济数据可以发现，内地旅客人数增加对香港服务业增长和就业上升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证明“个人游”产生的市场扩展为香港本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整体收益。但是，香港民间对社群边界的强调却在经济无边界扩展中浮现，显然不符合“经济至上”的假设。社会学者刘兆佳提出，香港人具有“功利家庭主义”的特征，注重功利性和家庭领域，淡漠社会整体和社会理想。^②2012 年“香港人利益”话语流行、呼吁边界控制的社会运动也显然不太符合“功利家庭主义”的论断。内地学者封小云认为，2012 年边界控制的社会运动源于“个人游”带来的社会互动增加并未改变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差异。^③社会学意义上的互动指一个相对稳定持续的沟通过程，采取“个人游”的内地游客平均留港时间不足 3 天，半数以上为不过夜者，这样短暂的停留时间不足以形成实质性的社会互动，即内地访港游客增加并不等于两地的社会互动增加。而香港居民主要来源于内地，他们与内地居民之间是否存在那么深刻的文化差异则是很有疑问的。

李钜威和刘兆佳的论断都基于这种假设：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的特征是流动性大而难以内聚或本质化。然而，以 1982 年香港本地出生人口超过 50% 为标志，香港已经逐渐转变为本土社会。根据香港出入境处和统计处资料，香港 2000—2011 年平均每年移入人口约为 4.7 万人，每年移出人口约为 0.95 万人；到 2011 年人口普查时，本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 60.4%。由此可见，香港人口变化的整体趋势是流入大于流出，而净流动带来的人口增长不及本地人口增长快，即大部分人口在本地沉淀和积聚起来。同时，近 10 年来香港还逐渐形成了两个新的社会特征：其一是本地人口的空间流动性下降。2011 年，香港移出人口只相当于 1998 年的 43%，在内地工作人口只有 5.4 万人，相当于高峰年份 2005 年的 1/4，700 多万人口滞留于本土，劳动市场和生活空间必然趋于拥挤。其二，向上社会阶层流动减慢。笔者对香港社会流动数据的研究发现，香港近 30 年来向上社会流动的规模和跨度下降，其中最近 10 年间中产阶级人口减少，向上流动比例小于向下流动比例。^④从社会发展的逻辑来看，当一个社会人口总量不断增加、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不断下降时，社会内部的竞争和挤压必然越来越强。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人利益”的政治话语能够流行并为一般市民所接受是容易理解的。近 10 年来国家政治以及地方经济竞争深刻影响了香港，而总量日增的内地游客进入加深了香港社会空间的拥挤感，“香港人的利益”作为一种政治构建把内地假想为对立方在所难免。

① Kui-Wai Li,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Economism in East Asia: The Rise of Hong Kong, Singapore, Taiwan and South Korea*. London: Routledge, 2005.

② S. K. Lau,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封小云：《由香港奶粉限购引发的思索》，《信报财经新闻》2013 年 3 月 18 日 B16 版。

④ 黎熙元：《梦想与现实：香港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四、小 结

2012 年香港跨境活动与边界控制同时增强的态势，反映出经济扩展无边界和社群利益有边界、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增加和社会流动性下降等内在结构性矛盾已经形成，这些结构性矛盾在政治化的环境中会通过各种激烈的形式表达出来，持续挑战特区政府管治和香港政治力量的智慧，也使香港和内地的关系变化更趋曲折。对于香港研究学界来说，2012 年的社会大事和社会运动显示出香港已不能以移民社会的理论范式来认知和判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自由行对香港各个行业薪资的影响

王 煜

摘 要：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加剧，香港的经济似乎重新走到了类似 2003 年的低谷。在香港与内地各个方面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的形势下，中央政府也开始希望通过进一步放宽自由行的条件刺激香港的经济。但是，在进一步扩大自由行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香港民众开始抵制内地游客。在 2003 年之后，香港民众游行抗议频发，香港在回归之后局势骤然升温。笔者以香港行业的实际薪酬（收入分配）为切入点，从经济的视角分析自由行对五大行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实际平均薪资指数的影响。通过对 2000—2011 年五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自由行对金融保险业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业，对建筑业产生负的效应，而对其他行业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关键词：自由行；行业薪资指数；面板数据

一、引 言

（一）自由行的背景和发展

港澳回归之后，随着港澳和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港澳和内地居民的相互流动量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开放自由行就成为必然。促使两地开放自由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 2003 年“非典”的暴发，港澳经济一落千丈，港澳几乎是一片沉寂。通过中央政府和港澳特区政府的协商，内地及时地与港澳特区政府签署和实施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 CEPA），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允许内地部分城市居民以个人身份赴港澳旅游，从而全面开放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以期通过促进港澳的旅游业，带动港澳整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港澳游初步发展起始于探亲游（1983—1998 年），第二阶段是以港澳游作为成熟旅游产品出现（1998—2003 年），第三阶段是港澳游全面开放即港澳自由行阶段（2003 年至今）。

（二）其他因素对行业薪资的影响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对策》一文中，李布和提到垄断行业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比非垄断行业做得好，因此行业垄断度对行业薪资影响较大。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王亚芬证实了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对行业薪资有着重要的影响。武鹏在《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研究述评》

一文中提到五个方面：第一，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要较大幅度地高于非垄断行业职工，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是造成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这其中又尤以行政垄断最为学者们所诟病。如姜付秀和余晖（2007）严厉而不失恳切地批评道，我国行政性垄断并没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而表现出些许改变的迹象，其造成的社会福利性损失已经到了严重威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和导致初次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的地步，利益集团的形成有可能使改革难以深化，从而危及执政的社会基础。第二，包括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等内容的人力资本对于中国行业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总体解释度不高，且任务重，周云波（2009）的研究发现其影响程度在逐渐地缩小。第三，制度因素对于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亦非常明显，这主要体现在所有制方面，如国有控股程度和单位隶属行政层次越高的行业，其工资回报也越高（张原、陈建奇，2010）；国有企业的工资决定更多地依赖于外部市场环境和行业因素，外资企业的工资决定相对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因素（刘小玄、曲玥，2008）。此外，前文所提及的行政性垄断也可纳入这一范畴。第四，劳均资本投入和经营绩效等因素也都显著地影响着中国行业工资回报，但其总体解释程度非常有限（罗楚亮、李实，2007）。第五，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影响行业间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工会力量放在中国来看作用并不显著（张原、陈建奇，2010）。

综上所述，居民收入分配话题一直是学者讨论的热点，特别是城乡以及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但是香港不存在城乡和区域之分，所以我们从香港行业薪资差距的角度来探讨自由行对香港的收入分配的影响。从对行业收入差距测定的研究方法来看，金玉国（2000）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了行业合理收入的标准，运用相关系数与假设论证的方法得出行业间工资差别与行业垄断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杜辉（2008）则运用因素分解、等级评分和权重方法，建立行业合理收入差距指数模型。从全国来看，研究行业收入差距的很多，如伏帅（2008）对湖南省的研究、贾美枝（2008）对河北省的研究等。魏帅和刘富华在行业收入差距的界定和测算方法中，通过借鉴杜辉的方法（因素分解方法、等级评分法和权重方法），将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因素归结为五个基本因素，即劳动强度、技术复杂程度、劳动环境、行业风险和受教育程度。因此，笔者主要研究自由行代理变量对香港各个行业薪资指数的影响，选取行业垄断程度、男女性别比例、行业业务收益、行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控制变量。

二、实 证

（一）变量的选取以及数据收集

通过参考以上文献，我们选取行业垄断程度、男女性别比例、行业业务收益、行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控制变量，选取行业的薪资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自由行的人数作为解释变量。本文探究香港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和自由行对香港收入分配具体影响的大小。我们选取了建筑业、金融保险业、制造业、贸易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